

# 论移民作家的阈限空间

## ——评哈金的《移民作家》

孙 冬

**内容提要** 本文结合美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的“阈限空间”概念、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关于差异的理论以及萨义德和皮特·霍沃德对于后殖民文学的论述来分析华裔美国小说家哈金的非小说《移民作家》，试图揭示移民作家的身份和其叙事、语言等方面中存在的阈限空间。这个空间提供了一种民族或地域叙述的多种方案。

**关键词** 阈限空间 移民作家 差异 去本地化

孙 冬,南京财经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处,外国语学院教授 210046

《移民作家》是一部由美国华裔作家哈金所撰写的非小说。在书中,哈金将其对于流散作家生活和创作的本体论问题放在整个流散文学的传统之中进行探讨,试图界定流散文学与本民族和所在国历史、社会文化的关系以及其在整个世界文学发展中的位置和流变,并试图形成一个体系和语法来阐释那些非传统意义的民族文学和移民文学。

首先,哈金声称很难区分移民作家和流亡作家,而且这样的区分无甚必要,因为对一个作家国籍的考量永远是次要的。事实上,学术界也倾向于将二者一并称为流散作家。因为不同原因造成的移民、流放以及难民处境从根本上讲都是一种流离失所。流散者指的是任何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从一种语言迁移的另一种语言,从一种文化迁移到另一种文化的人。更有甚者,批评家乔治·斯坦纳提出20世纪西方文学这一整个类型,都是“域外”的,是一种由流亡者书写的和关于流亡者的文学。他解释到在一个造成这么多无家可归者的准野蛮文明中从事艺术创作的那些人,本身也都是无栖身之所的诗人和跨越语言的流浪者。古怪、高傲、怀旧、刻意地不合时宜……。莱斯利·阿德森则从人口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提出,移民文学指代任何在移民时代所书写的作品,它不仅仅是移民作家的专利。可以说,来自于不同背景的作家从不同的视角来展现流动和变革中的人和社会生活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移民文学。因此,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流亡(移民)时代,试图回答关于流散作家和他们创作的本体论的问题对于整个文学和艺术有着急迫的意义。

米兰·昆德拉将移民和流亡作家的处境比喻为“在钢丝上行走”。失去了语言和族群的安全网,流

亡者的生活好比在危险的高度艰难地保持平衡。他立于摇晃的桥上,新的环境还很陌生,过去的世界已经进入想象当中。在这样一个“危险的无所归属的地带”,一个差异、偶然和不可预测性的策源地,所有用来指认移民作家身份和叙事类别和意义的符号都处于一种“阈限”状态。

根据维克多·特纳的论述,阈限的状态描述一种中心和边缘的动态空间关系,它是一个向混沌敞开的、“非构建的,无边和无限的”社会空间;它逃脱了中心和通常来定位文化空间中的位置和状态的网络以及非此即彼的对立模式。这种阈限状态一方面使流散者陷入悲惨的境地,但同时也赋予了他们得天独厚的优势。萨义德说:“大多数人只存在和意识到一种环境、一种文化和一个家园,而流散者存在于和意识到至少两种。”艾德维志·但提凯特在《危险的创作:移民作家的的工作》一文中提出“移民作家的优势在于两个国家不得不在你身上融合,你出生时使用的语言和你死时可能讲的语言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在你的头脑中找到一块兼容之地,并相互融和。这些变化,正如特纳所言不仅是知识上和认识上的,更重要的是一种“存在的变化。”

在这样一个游离于两个体系的阈限地带,移民作家对于前文化中心的政治影响微乎其微。然而,在艺术上和思想上,他们的力量非但没有被削弱,而且还得到了强化。在前中心文化之外,流亡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民族或地域叙述的可行方案和多重角度。通过推进和重新界定本民族文学和所在国文学的边界,这些移民作家试图超越他们作为移民的边缘身份,超越萨义德所描述的充满痛苦、思乡、错位和丧失的写作模式,打破历史传统的一致性传递和完整的族群意识,将各种经验,思维习惯诗意地揉入小说当中,创造出一种新的语言来弥合和治愈由流散所带来的创伤和嫌隙,讲述复杂的文化状态和人类更普遍的心理和感情。

### 1. 作者的阈限空间

《移民作家》的第一章“部落代言人”围绕移民作家的身份、社会责任与艺术创作之间的矛盾纠葛展开,试图回答“谁在说话?作为谁说话?他的地位和责任?他如何获得叙述的权利?”等一系列问题。

首先,针对移民作家的身份和责任的问题,作者认为来自欠发达国家的作家总是倾向于以社会功能来定义自己,因为他们从小所接受的集体主义教育使得他们对于逃离祖国和同胞背负内疚感,而且,他们通常将流散生活看成是迫于无奈的短暂逗留,因而,他们自然而自觉地担当起为留在母国的被欺凌群体代言,保存那些没有声音的人们的记忆的责任。然而,实质上,哈金认为,这种社会担当并无坚实的根基,也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他以索尔仁尼琴、林语堂和奈保尔为例,指出在社会责任与艺术创作之间,作家必须选择忠于自己的艺术,因为就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而言,文学对于社会变革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其次,就文学作品的价值而言,只有那些穿越历史和政治屏障直抵人心的作品才能进入经典,任何附加的历史和社会维度只能损害作品的艺术价值。再者,寻找或充当代言人实质上等同于把具有分歧的经验和思想统一起来;同时将群体和艺术视为道德意识形态或民族文化的工具。一个受到此角色摆布的人无法直接和具体地去经验,也不能回过头对这些经验自由地反省和表达。其作品也丧失了灵活多变和深奥的可能性。这一角色的存在使得任何关于性别、族裔、历史、灾难的叙事都容易陷入先入为主的话语,使得任何个人风格都变得虚伪做作。

在《对流亡的自省》中,萨义德认为詹姆斯·乔伊斯的流亡是一种自觉的抵抗和缺席,因而成为创作力量的源泉。他说“乔伊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挑起一场与爱尔兰的争吵,然后把这场争吵的活力保存起来,以便维持最苛刻地反对熟悉的事物,以巩固他的不妥协和重申他自愿缺席的正当性。”纳博科夫曾经提出“非典型流亡者”的概念。即一个对任何文化、集体形态或政治生活保持怀疑,远离派系和流亡者组织的文学生活的独立的流散者个体。也正是由于这种自觉的疏离,纳博科夫的小说曾被批评为对形式过于关注,反而无视了内容,缺乏深度,而且缺少一种流亡生活的绝望和进入更高

层次的书写,或者说融入一种集体的对流亡苦痛的诉说和对国内政治进行批判的诉求(徐庆全)。这种概念化和形而上的“典型流亡者”,按照皮特·霍沃德对于后殖民理论和文本的分类,是一种“特定的”角色,而非“特别”的角色。在《绝对后殖民:》一书当中,霍沃德对于“单一的”、“特定的”和“特别的”文本进行了区分。“特定的”是一个被动和客体化的形容词,它描述一种被强加的关系,将个体看成是由某种内在的、不变的种族、性别、民族、文化、精神的特质所决定的,将本质上不同的文本简单化地放入一个被贴了标签的篮子里,并提供给读者如何去阅读它们的指导。“特定的”关系和功能更像是一个胁迫性的机制,迫使文本意义趋同。与此相反,“特别的”是一个积极的形容词,它强调主体在政治和道德选择中的自主性,抵制根据某种文化话语(后殖民、女性、流亡的话语)存在、流传和起作用的特征预先定义文本的意义。而所谓“单一的”文本是那些完全去除外部能指的,封闭自足的文本。因而,纳博科夫的“非典型的流亡者”是一种“去特定化的”特别的主体,他的身份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矛盾的、暂时的,依照环境变化的状态;“非典型”流散文学应该是一种“去特定化”的、自由的书写,它讲述的是个体的真诚体验,一种独特的文化记忆与随着新的生存条件、环境和新的文化社会形态而不断修正的自我意识相结合的产物。

一个移民作家不必为着整个民族代言,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叙述本民族历史和现实的权利。移民和流亡作家被质疑最多的是他们远离其笔下的人民,没有真实地参与他们的生活。对此,哈金辩驳道:“但丁并不需要回到佛罗伦萨才写出《神曲》,乔伊斯也不需要回到都柏林才写出《都柏林人》。文学本身是一个作家的真正合法的护照,其作品的艺术性是作家的唯一评判标准。事实上,在当下,全球化的进程使得这种游牧式的写作成为一种新兴和合理的模式。居住在日本的英国作家大卫·皮斯的《1977》等多部小说以英国约克郡为背景,展现了一幅幅具有浓郁地域特色和历史风情的画面。乔治·赖明在伦敦创作了关于加勒比当代生活的小说《冒险的季节》。Iva Pekárková的《给我钱》是一部关于在纽约开出租车的捷克妇女的小说,小说在捷克出版,而当时作者本人居住在美国。再回到捷克之后,她将小说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随后她移居英国。

因此,在移民文学中存在一个悖论的事实:流亡、移民和其他全球化进程的流动性和多样性反而使得写作本身减弱了差异和等级的层面,超越了此时和此地的情境、增强了抽象和虚拟的层面。以叙事结构为例,真实的作者作为差异性主体的功能被文本中虚拟的陈述主体所取代。陈述的主体在文本内部,它所遵循的规则是秩序的规则,而非文本外的因素,它带来的是再铭刻和眷写的可能性,而非局限的可毁灭的个体性。这个叙述的主体将想象与记忆结合起来,且与叙述的内容保持距离,这样,陈述的可行性并不取决于作者和他所说的东西之间的关系,或者和历史真实的关系,不会因为作者个体的身份和空间的改变而受到损害。

## 2. 语言的阈限空间

流亡作家常被指责为背叛。他们未能与他笔下的人物一起同呼吸共命运。更有甚者,他还抛弃母语用英语写作。这种语言的背叛是移民作家背叛祖国的最后一步。对此,很多移民作家都进行了自我辩驳。卡马拉·达兹,一个使用马拉雅拉姆语和英语写作的印度裔女作家,声称她使用的充满“可笑、扭曲、怪异”词汇和结构的“半英语、半印度语”的语言是诚实的,是可以表达她的渴望和快乐的独一无二的、活生生的语言。自称以色列的阿拉伯裔基督徒的小说家安东·沙马思一直坚持以犹太语而非母语——阿拉伯语写作,因为他认为一个作家不能使用他热爱的人们能听懂的语言来书写他们的故事,否则他就失去了写作的自由。布罗茨基曾断言当一个作者使用非母语写作时,他要不是出于生计,像康拉德;要不就是出于野心,像纳博科夫;再或者是为了陌生化的效果,像贝克特。而这三种动机无疑都是正当的。

不管使用非母语写作的动机如何,它不可避免地重塑作者的身份、书写的方式以及他书写的过去。哈金在一篇访谈中也坦陈这一点。在《移民作家》中,他通过分析纳博科夫的小说《普宁》和澳大利亚作家、诗人大卫·马罗夫的小说《想象的生活》中的语言,指出移民作家能够并有必要在非母语中开启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由于作家对所使用语言的陌生以及其母语提供的力量,使得原本陈腐的(非母语)词汇和表达获得了新奇,混杂和误用可以产生幽默,这种语言超越了单纯的能指,真实地反映了移民者的文化和身份错位,体现了游牧性语言的特质。对于读者而言,另类的幽默、关于词语和事件的文化政治寓意必然会引起某种误解,然而和这种最初的语言和文化不适感相伴随的是一种陌生化的效果,一种在熟悉之中的怪异。

在这里可以使用德勒兹的关于“差异”的理论来说明这个语言的阈限空间是如何产生的。事实上,德勒兹本人也曾描述过一种分界模糊的“游牧空间”。在《差异与重复》一书中,德勒兹将事物的关系都归为分离性的合体序列和连接性的合体序列。连接性的合体使事物之间趋向同一和秩序,而分离性的合体序列则产生相互联系但迥异多样的个体。连接性的合体构成阿多诺所说的“被操纵的世界”和预设的家园,即国家、作为结构的语言以及为人类文化合法机制的象征序列等等。流散作家的宿命和知识使命可以说是拒绝连接性的合体序列的影响,拥抱分离性的合体。每个分离性的合体序列里面都包含一个虚拟的元素,沟通不同序列之间的差异。在移民作家的作品中,这个元素可以说是那些没有任何能指的外语表达、生造生僻的词汇、以及陌生化的用法,他们使得一种“主要的语言”和主要的文化意识去“本域化”。所谓“本域化”的语言是指一种观念上、政治上和社会上被符号化和秩序化的语言。而去“本域化”的语言起到了各种分离的序列的分流和增值作用,并通过差异本身使得连接性合体序列与分离性合体序列发生以新的方式相沟通和呼应。这样各种混杂的语言和经验,虚幻和真实生动地并存在作家作品的不同维度并使得书写和阅读成为诗意的经验;也就是说由于这种“分离的合体”的存在,小说的叙事被从言说正常秩序的维度中减除了,但并没有消失,而是进入了一个阈限的地带,在这个地带作者既能调集其语言体系的有效资源又能摆脱其固有的意义包袱,制造变奏,散播叙事的历史性和文化意义,凸显再现的幻觉,以一种“类似孤独般的自由”去使先前被遮蔽的“不可能之物”以及“与之无法进行对话的他物”的力量呈现出来。

### 3. 历史叙事的阈限空间

在《移民作家》当中,哈金声称怀旧是一种不必要和不合时宜的感情,它更多地体现移民对于未知世界和命运的恐惧。他引用拉什迪的话说:“根,我想只是一个保守的神话,想要把我们栓在原地。”同样,赛义德在《寒冬心灵》中也警告将过去神化的倾向使得流亡者失去与现实的联系和责任,“完全退行到过去的记忆和过去的表现形式,移民作家只会囚禁在一个被剥夺意义的幻觉的世界,因为,首先不存在一个可以回归的、不被‘现在’的秩序所重塑的过去,没有一种艺术创造能完全复制传统的形式,而不被现在的身份和技术所改变。其次,历史存在和运动的模式,根据德勒兹所言,是交汇流动、共处冲突的。任何历史的片段都不是受某种超越性定律所支配的,内在自足的平面。”

但是,在作品中逃脱家和历史的叙事也是不可能的。希利斯·米勒认为文学作品本身具有“行为功能”,书写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和行为本身。海顿·怀特在《形式的内容》中也断言“叙事不仅仅是一种中性的思辨形式……它赋予(读者)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选择,甚至是某种特定政治内涵。”在《绝对后殖民》中,霍沃德认为在后殖民文本中,那些“特别”的叙事既不像“特定的”那样僵化地表述关于政治和文化的概念,也不像“单一”的叙事那样脱离社会文化意指功能,而是扰乱和颠覆特定的身份和关系结构,并保持文本的政治和批判维度。霍沃德认为“特别的”后殖民文本在根本上讲是富于斗争精神的,但与“特定的”文本相比,它更加关注“如何”而不是“什么”。

因此,流散作家的政治倾向和批判功能不是迫于社会的要求,而是出于历史叙事自身结构的需要和一种对抗历史失忆的欲望,而且这种记录不是编年的再现,不是严格地恢复历史原貌(因为历史话语的存在从来都无法排除空缺),而是聚焦于个体和主观经验的历史证词,凭借的是记忆去除了表象和具体性的非理性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流亡作家如果不能与过去保持一种创造性和感性的联系的话,他只会沦为苍白的记录者。叙述的语言并不是透明的介质,而是充满了虚构性的重构。这种创造性的视野可以颠覆官方的历史叙事,可以使“不在”成为真实的存在,使民族和历史的创伤更加真实地在这场。在这种叙事当中,过去并没有被淹没,而是被重新展现。

在书写《移民作家》的过程中,哈金在思想上完成了一个从身份焦虑和寻求回归到最终拥抱悬置的身份和无根状态的转变。这转变使得一个移民作家能够警觉地归属于两种或多种身份,以灵活的方式与各种文化情境和文本发生关系,拓展民族文学和语言的疆界,开辟一个同时包含过去,现在而未来的空间;在去除宏大历史和民族话语的同时,又在当下的主流文化中重建一种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记忆。

### 参考文献

1. Adelson, Leslie A. *The Turkish Turn in Contemporary German Literature: Toward a New Critical Grammar of Migration*. New York: Palgrave-Macmillan, 2005.
2. Bolaffi, Guido, Raffaele Bracalenti, Peter Braham, and Sandro Gindro, eds. *Dictionary of Race, Ethnicity and Culture*. London: Sage, 2003.
3. Chiesa, Lorenzo. *Subjectivity and Otherness: A Philosophical Reading of Lacan*.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 2007.
4. Deleuze, Gilles,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Trans. 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 and Felix Guattari,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trans. Dana Polan,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6.  
---.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 Robert Hurley, Mark Seem, and Hellen R. Lane, London: Athlone Press, 1984.
5. Guo. Rong. *Approaching History: The Fictional Words of Hajin and Yan Geling*, PhD. Diss., University of Alberta, Spring 2011.
6. Ha, In. *Writer as Migrant*. Chicago: The U of Chicago P, 2008.
7. Hall, Stuart. "New Ethnicities." *The Sociology of Race and Ethnicity*. Ed. Malcolm Cross. Vol. 1. Cheltenham, UK: E. Elgar Pub., 2000. 102-09. *Google Books*. Web. 12 Apr. 2010.
8. Hallward, Peter, *Absolutely Postcolonial: Writing between the Singular and the specific*.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2001.
9. Hana Pířhová. *The Art of Memory in Exile: Vladimir Nabokov and Milan Kundera*.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2.
10. Kellman, G Steven. *Switching Languages: Translingual Writers Reflect on Their Craft*,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2.
11. Kundera, Milan.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trans. Michael Henry Hei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4.
12. 徐庆全:《纳博科夫:一个非典型性的流亡者》,〔北京〕《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33期,online, CNKI 知网空间。

〔责任编辑:天 则〕